

《高等学校哲学研究文库》

—当代中国哲学热点问题透析—

林娅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哲学热点问题透析

林 娅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哲学热点透析 / 林娅主编.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9

ISBN 7-5620-2016-7

I. 当… II. 林… III. 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793 号

责任编辑 刘 军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北京市通堡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10.25 印张 245 千字

2000 年 9 月 第 1 版 2000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620-2016-7/D·1976

定价: 17.00 元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编: 100088 **电话:** 62229803 或 62228801

声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 由本社发行科负责退换。

前 言

在迈向新世纪的时刻，中国人民十分骄傲与自豪，我们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举杯，为事业的兴旺发达而欢呼。当回顾走过的艰苦历程时，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不对社会科学研究所付出的艰辛而进行思索。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开放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接受着挑战，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与挑战。面对新的思潮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不断反思和不断探索中昂首阔步地前进，发挥着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也给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生和活力。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的反思，突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哲学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过程中起了先锋的作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推进了改革的进程。随着社会科学杂志的复刊或新建，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研究也就更加广泛和深入。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它更需要对以往的思想观点进行再认识，它也需要在新的世界思潮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打破僵化的思维模式、冲破错误思想的束缚不是一个简单地宣布一下就可以奏效的事情。建国以后，随着我国的逐步发展与强大，随着个人迷信与崇拜的蔓延，由于党中央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与判断，使我们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进行了长期的、不间断的阶级斗争，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转移

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因而，使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上，阶级斗争不仅不能忘记，而且要天天讲，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路线斗争上，注意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使人们生活在一个缺少活力和信任的环境中，人人自危，处处小心谨慎，这样的状态很难产生新思想，很难有所创新。当人们从噩梦中惊醒过来时，发现我们已经与世界飞速发展的状况极不相称了。具有优秀文化传统，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曾自认为能承担起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历史重任的先锋，怎能一下子成为必须昂起头才能看到别人面目的状态，如此尴尬的状态怎能不令人难堪。但是有着不屈不挠斗争传统的中国人民并没有气馁，象他们的先辈一样，在错误与曲折中顽强挺立，他们擦干眼泪，排除人为的敌对和对抗，在新的道路上进行探索。

邓小平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站在时代的前列，果断地引导中国进行“第二次革命”，力挽狂澜，终于使航船驶向了正确的航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今天我们面临的时代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前进的时代。时代的变化使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发生了很大的转化。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与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面对世界哲学研究的新特点，反思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哲学，使哲学工作者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与迷惘。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许多哲学工作者奋起直追。探讨现代西方哲学的变化，研究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面临的新问题，从而使我们的哲学舞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现代西方哲学，从上世纪中叶，特别是于本世纪初开始，发生了重大转折，有些学者把它归结为五个“转向”：反形而上学的转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实践的转向，反主体主义（反人类中心论）的转向。这五个“转向”可视之为现代

哲学与传统古典西方哲学不同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众多哲学派别一反传统哲学远离社会，远离实际的纯思辨性，使哲学的目光投向现实社会，转向人生问题：他们摈弃传统哲学的主客分立的二元性、先验性和实体性，强调主客融合，天、地、人、神四元一体；他们不满传统理性哲学侈谈抽象人性、人的本质，而重视与强调人的意志、情感、欲望和性本能冲动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与意义；面对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他们批评传统哲学抬高普遍性、整体性，贬低特殊的思维方式，提倡特殊性、多样性，重视对于特殊性、个性的研究。总之，党派林立的局面，表现了西方哲学对于时代的关注与研究的深入。

现代西方哲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转向”的缘由何在？

首先它是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我们应该从时代谈起。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正如黑格尔说的：哲学不能超出它那个时代，正像个人不能跳出他所处的时代一样。所以，现代哲学的“转向”决不是偶然的，是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产物。从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初，西方各国资产阶级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西方世界社会的主要矛盾就由原来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让位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来所固有的矛盾日益突出。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这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而进一步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当今西方世界，各国政府、统治集团虽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许多调整和改善，促进了生产与科技向前发展，但是，它终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

主义社会的这个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日益增加，西方世界社会中的各种新的矛盾与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形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分裂、科技进步与人性失落的分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分裂。资产阶级上台后，由于重视和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使生产力飞速发展，在它统治不到一百年期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在赤裸裸的金钱拜物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消失了，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性王国”化成泡影。“社会病”日益严重，诸如吸毒、犯罪、赌博、自杀、酗酒等到处蔓延，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的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深刻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与物质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科技的发展，现代化大生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劳动者减轻和摆脱了笨重的体力劳动，但劳动者却又成了机器的附庸，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产品变成“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使人失去了人的特征。社会异化、人性异化，是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的必然结果。

由于哲学家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其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也就各异，甚至相反。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观察现实社会，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入手，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唯物史观。它科学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致命伤”，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是无法解决的，要医治这种“顽症”，必须从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着眼，用革命的手段，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之以比它高一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的实践的转向、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创立，正确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它以改造旧世界，变革社会，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为己任。西

方许多人本主义哲学家也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目睹“理性王国”美梦的破灭，并加以抨击，他们不时发出“西方没落”的哀叹，并且将怀疑的目光直指理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中寻找原因，而是从人自身，从人的内心世界，人性，人的意志、欲望和情感等方面，去寻求医治西方“病态”社会的灵丹妙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违反人性的东西，他们呼唤人性的复归，倡导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幻想一种理想人性社会的出现，试图用非理性主义代替理性主义。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这种现实的回应，对当今时代发出的呼唤。

生态危机成为今天全球性问题之一，是人类共同关心的一个焦点。道理很简单，生态危机困扰着人类，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政治家们为协调各国的力量，制定方案，统一行动，为管好人类家园——地球而进行不懈的斗争；自然科学家从生物圈与技术圈的角度，对解决生态危机提出种种理论；经济学家对“地球村”人口的极限一再发出警告：“只有一个地球！”哲学家们则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从价值观、伦理观出发，对长期占据哲学讲坛的唯人至上的主体主义——人类中心论进行尖锐的批判，这是哲学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具体体现。

第二，现代哲学的“转向”，还有其自身发展的深刻原因。西方传统哲学（从古代到近代），虽然有不同学说与派别，但从本体论上说，它们都属于形而上学，它的中心问题是研究和追求一种超验的本质、实体。同时传统哲学一般都以普遍性、同一性为其最终目标，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是如此。苏格拉底的“对话”，孜孜以求的真理，就是普遍概念、一般定义。柏拉图提出的作为绝对存在的“理念”，是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到了近代，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康德提出了先

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即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问题，强调普遍必然性。黑格尔则认为，唯有他的“绝对观念”才是一切矛盾的调和、最高的同一、最大的普遍，因而是绝对真理。他的哲学体系就是描述思维与存在如何从对立到达同一的过程。近代经验论者虽然注重个体性，但他们所说的经验仍然是在多样性中概括的普遍性。总之，在传统哲学看来，普遍性、同一性高于特殊性、多样性；由于崇尚普遍性、同一性，总是想方设法克服差异性、超越特殊性。这种以普遍性、整体性压制特殊性、多样性，成为哲学前进的一种精神包袱，成为现代哲学家众矢之的。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发展、变化成为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重视人的问题，就必然加重对于特殊、个性的关注。早在上世纪50年代存在主义的先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针对黑格尔重普遍轻特殊的观点，提出“特殊性高于普遍性”的论断，他认为作为主体的人，是特殊的、具体的人；只有特殊的、具体的人，才能拥有自我，才能谈得上独立自主性，才能体现人的价值。既然人是生存着的特殊的个体的人，他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和矛盾之中，永远是不可能全面的、完美无缺的，总是有缺陷和片面的，总是处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中。同时，社会的急剧发展使个性问题日益突出，科技的发展，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不断有所创新，否则就会被淘汰，创新就要与众不同，因而，现代西方哲学重视个性、重视对于特殊的研究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对于特殊、个别的重视，导致了另一种哲学倾向，那就是一反传统哲学的一元论倾向，倡导多元论，成为西方哲学的一种时尚。

由于哲学家们用固定的哲学模式，用永恒的哲学原理，以及实体、本质、存在等概念范畴，把哲学研究的对象人为地纳入其

中，形成包罗万象的、永恒不变的、死板的形而上学封闭体系。事物是多样的，世界永远是开放的体系，因而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也应是多样的、开放性的。任何一种学说、一种思维方式，都是有限的，只能认识世界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某一层次，而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所以哲学对世界事物的解释，不能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的、多维度的，哲学应该是一种变化的开放的系统。针对传统哲学的封闭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把多元论观念看成是“当代哲学的最大成就”。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指出：笛卡尔主体哲学的错误，就在于将自我的成千上万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将多元的个体抽象为一个统一体，这样抽象的“主体”只能是虚构的、封闭的。尼采也认为：统一性（一元性）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是力的信号。

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哲学的转化对于中国哲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20年来，我国的哲学研究也出现了与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同的状态。这不仅表现为研究的深度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研究的角度与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热点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主体性问题日益突出。计划经济条件下，人的地位作用基本上是由上级确定下来的，人不需要自己多加思索，当好自己这颗螺丝钉就可以安稳地生活下去。改革开放的浪潮打破了宁静的生活，自己的命运不再是由别人安排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因而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与以前发生了变化。重视主体、注重个人，关心人的价值等等问题成为新的热点。经济发展同样使我们面临科技、环境、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现代西方对于环境以及全球问题的关注也迅速地影响了我国的哲学工作者，这些都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因而在近些年的研究中也同样出现了类似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本书就是侧

重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不是哲学家们杜撰出来的，不是哲学工作者头脑发热的产物，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真反思，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的积极思考。当然本书也不可能把近20多年来哲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都能够反映出来，只是就我们已经思考过的问题，加以探讨，为进一步促进哲学的繁荣与发展提供粗浅的看法。

本书由林娅主编，负责全书的总体设想，拟定编写大纲，组稿统稿。作者分工如下：

袁德峰（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第一章）

涂 强（北京电影学院，第二章）

陈雪英（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第三章）

陈 红（北京教育学院，第四章）

温京萍（清华大学，第五章）

胡懋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六章）

林 娅（北京大学，前言和第七章）

侯铁桥（清华大学，第八章）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北京高教学会哲学研究会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从人道主义到价值哲学	(1)
一、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5)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学说	(12)
三、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底蕴	(23)
四、人的主体性的真谛	(27)
五、从人道主义生长起来的价值哲学	(30)
六、人的价值哲学的延伸——人权理论	(33)
第二章 主客关系论与实践唯物论	(38)
一、体系的困惑与改革	(38)
二、主客关系与主体性原则	(54)
三、关于实践唯物主义	(66)
第三章 从真理论到价值论	(84)
一、从认识论的真理论中生长出来的价值论	(84)
二、主要争论透析	(91)

三、价值与评价	(108)
第四章 现实的挑战——现实中哲学问题	(118)
一、公平与效益	(118)
二、经济发展的道德忧思	(133)
三、人心深处的变革——中国人实践视角的转换	(148)
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艰难取舍	(156)
一、社会变革引起的文化困惑	(156)
二、中国传统文化之合理性批判	(171)
三、中国传统文化之现代化建设	(178)
第六章 科学的挑战——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194)
一、从不同的科学判定标准所引发的争论	(194)
二、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在中国	(203)
三、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211)
第七章 人类生存面临的挑战——环境与发展	(228)
一、生存危机与生存哲学	(228)
二、价值观的转变	(251)
三、环境伦理观——现实发展必然产物	(263)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	(277)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被曲解的	(277)
二、沉重的代价	(288)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	(301)

第一章 从人道主义到价值哲学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重要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如春风化雨滋养了，激活了我们民族在极左路线桎梏下封闭、干涸的心田，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已企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的新的人文思潮。这个人文思潮尽管某些方面还未能尽如人意，还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与问题，但就其主流来说，八十年代的人文思潮与张扬人的历史主动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的历史进步，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八十年代经济腾飞，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社会巨大进步的思想基础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一人文思潮重大意义的认识，将越来越深刻：它是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社会大繁荣的思想先导和舆论准备，同时，也必将影响到下个世纪我们民族的思想进程和社会历史进程。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在这一人文思潮中具有基础和首要的意义。在哲学问题的探讨中，人道主义、人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人权等一系列人学问题首当其冲，这样，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经过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讨论，哲学思维的视野也就逻辑地转向了人，转向了人本身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人们会问，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船刚刚启锚，准备扬帆远航的时候，掀起了人的问题的讨论热潮呢？

首先，粉碎四人帮，进行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面对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面对着极左路线下排除了对人的研究的客观事实，人们迫切需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拒绝人、不重视人、不关心人？如果马克思主义不重视、不关心人，那么人们也就不会重视和关心马克思主义，它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也就无从实现。人学问题的讨论回答了这一问题，所以说，人学问题的讨论首先是恢复并确立马克思主义权威的历史需要。其次，人学问题的讨论也是对极“左”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灾难进行反思的需要、由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似的国家。有着“左”的阶级基础，党的历史上就有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左”的错误并没有彻底克服，一到条件适合，就会兴风作浪。文化大革命就是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错误的极致。一九五七年后和六十年代初期，就开展了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对人道主义不加区别，只要提到人道主义，就是“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唯心史观，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讲人道主义就不能讲阶级斗争，二者势同冰炭，不能调和。共产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之命，林彪、“四人帮”利用封建帮派，对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大搞法西斯专政，人道主义荡然无存。在理论上把人性、人的价值、人权等一系列人学问题一律贴上资产阶级标签，扔进历史的

垃圾堆。由于所谓斗争哲学大肆泛滥，文化革命中充满了愚昧、偏见和仇恨。到处制造冲突，人与人之间有着广泛的思想对抗和行为对抗。领导与群众对立、朋友之间对立、甚至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也呈现尖锐的对立状态。对此，人们进行了历史的反思。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固然有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拒绝研究人的问题，不尊重人，不关心人，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次历史灾难都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对极左路线及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沉痛反思并提出人的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是历史进步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几千万人的死难和巨大的历史倒退，在欧美各国不是掀起了人道主义讨论的热潮吗？再次，在这个时期开展人学问题的讨论是唤醒和张扬主体意识，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当中华民族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后，发现自己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加大了。为了缩短距离，迎头赶上，必须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唤醒和张扬主体意识，增强人的主观能动性，遵循客观规律，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是在经济改革中却有只注重体制而忽视对人的研究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哲学侧重把人作为目的，而经济学则侧重把人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手段。在这方面，甚至有人主张在社会化管理中，应该象西方控制论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只把人作为控制对象。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中，由于缺乏对人的主体目标的设计，既影响了改革开放本身，又影响了为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即塑造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奋斗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尊重人，不关心人，是绝对不能成功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旋律。而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主体意识。由此可见，人既是社会的目的，是主体，

又是社会的发展力量，是客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掀起的人学问题讨论热潮，既有利于反思历史，恢复马克思主义尊重人、关心人的真实的历史面貌，又有利于弘扬主体意识，动员亿万人民群众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洪流中去。另外，作为世界哲学一部分的中国哲学，必须汇入世界哲学的主流。这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人学问题讨论的历史文化背景。

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世纪末回眸：

我国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它将持续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在第一阶段，由于“左”的路线和思想的严重制约，不断掀起批判人道主义的热潮，认为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宣传人道主义就是宣传阶级调和论，共产主义世界观中不包含人道主义。这个时期对人道主义的研究，既没有讨论的环境，也没有讨论的气氛。谁提出一点不同意见，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就扣在谁的头上。由于基本是“一边倒”，所以与其说是讨论，不如说是批判。这个时期也没有出版过关于人的问题的科学著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思想路线旗帜的指引下，第二阶段初期的人道主义讨论与第一阶段不可同日而语。讨论者范围之广，人数之多，讨论方式之民主，讨论之深入，都是前所未见的。应该说，人道主义讨论已经上了一个较高的层次。第二阶段初期讨论的主题是恢复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地位。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